

作者認為，毛澤東作為政治企業家，在長征後尤其是開闢了陝北根據地以後，無論是面對盟友張學良、楊虎城，西路軍的領導人張國燾，還是他的競爭者蔣介石，以及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侵略者，都能採取適時、適當的策略來擴大中國

共產黨的影響以及軍隊的實力，來鞏固自己在黨和紅軍的地位。因此，長征的意義就更加凸顯了——它不僅像黨史所描述的那樣，在於保存了紅軍的力量，宣傳了革命，還在於為革命造就了一位雄心勃勃的領導人。

農業社會的現代轉型困境

● 周祖文



傳統中國的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無法將公共事務轉變成數字。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效法。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

1979年，黃仁宇被紐約州立大學解僱，此時，其成名作《萬曆十五年》的中、英文書稿即將出版。1980年

下半年，黃仁宇開始撰寫《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引用只註頁碼）。實際上，黃仁宇整個後半生的求學與學術經歷都是在回答前半生的一個用生命加以體驗的問題：為甚麼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了，而共產黨勝利了？或者用黃仁宇更有「大歷史」意蘊的話來說：為甚麼農業社會的中國面臨現代轉型時困難重重？

黃仁宇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它不能從數字上管理國家（頁9）。在把歷史往上推近四、五百年，黃仁宇認為從明代開始，國家的構造就從宋代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立基於農村村落的層次上（頁374），傳統中國的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無法將公共事務轉變成數字。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效法。如果產生實務上的困難，忠心耿耿及

足智多謀的官吏必須絞盡腦汁，設法加以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個人的犧牲在所難免。古代中國在世界上具有無需競爭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現實有出入，也無關緊要。然而，國民黨的難題是，它打算在二十世紀再重複這個過程，但中國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無處可藏（頁8-9）。對於共產黨中國，黃仁宇暗示也存在同樣的處境。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問題在於，以龐大的農業社會的單純結構，突然之間必須響應現代世界的挑戰，因此產生各種矛盾與複雜的問題（頁62）。

一 對國共內戰的解釋

為甚麼國民黨戰敗呢？這牽涉到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認識。黃仁宇認為，1949年前的中國有三種不同的經濟體系：一是作為日本衛星的工業化東北，二是主要配合西方的東南通商港埠現代經濟，三是內陸的農業地帶，後者落後於前兩者達數百年（頁482）。國民黨依靠東南的現代經濟，而對於農業社會則沒有動員能力。黃仁宇以魯迅小說為例，說明精英階層與底層農民連交流都成問題，因此，上層與下層之間近於隔絕。此外，為了獲得美援，國民黨不得不對軍隊進行精簡，以質量取代數量，配備美軍的現代化裝備；但愈是現代化的裝備，就愈依靠鐵路等現代交通。

總之，黃仁宇把國民黨的內戰策略稱為「資金密集」型戰爭，但這種策略並不適合於以消耗戰為主的

內戰。內戰前，國民黨讓非正規的輔助軍隊成為外圍助力，軍隊更適應鄉村；內戰時，強化作戰部隊的政策反而成為一大弱點（頁118）。而共產黨的內戰策略則是「勞力密集」型戰爭，其軍隊處於急劇擴張之中，以數量取代質量，打的是消耗戰，用的是「人海戰術」。國民黨軍隊雖然裝備了現代化設備，但彈藥極其缺乏。

純粹的軍事解釋並不是最好的解釋，事實上黃仁宇並不試圖採取這樣的解釋進路。他對共產黨勝利原因的解釋更傾向於作中國社會結構的剖析：通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頁243）。共產黨把整個農村完全動員整合，緊接戰場後方的是村落的人員。由於村民必須供應食物、住處及急救設備，各種後備支援就這樣以自動貢獻的名義，定期而自動地輸送到前線，作戰部隊完全擺脫後勤的負擔重任。就技術上來說，共產黨開啟「勞力密集」的革命，將一切降到農民層次，以吸引最多的追隨者（頁168-69）。

不過，作為提倡「大歷史」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採取的是長時段視野。他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視為不只是對手，兩者還在一個巨大的運動中互補，只是彼此偶有重疊。即使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也應該放在三、四百年的歷史架構內來審視（頁99）。國共爭鬥的

黃仁宇對共產黨勝利原因的解釋更傾向於作中國社會結構的剖析：通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

希特勒會對副官說笑話，斯大林半夜會小飲一番，蔣介石卻總是自我克制，不曾有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黃仁宇認為蔣介石的境遇，不正是中國農業社會結構缺失的形象化象徵嗎？

時期雖然顯得很長，但實際上只是鴉片戰爭啟動歷史事件以來的其中一環。在現代中國歷史的所有層面中，都貫穿一個基本議題，即中國由文化主導的政治工作體必須轉化成現代國家，以便能從經濟上管理公共事務。在蔣介石以前，這個問題甚至還沒有被國人所了解。在毛澤東掌權後數年，中國人口還只能約略概算管理，這顯示中國轉化成現代國家的路還很漫長（頁243）。

二 道德？技術！

黃仁宇初到美國時，其國民黨背景令他處境尷尬，美國政府和民眾都指責蔣介石腐敗、無能，把美國援助都打了水漂。黃仁宇對這種道德化的解釋是完全反對的，他的歷史觀屬於典型的技術論。在黃仁宇那裏，道德與技術是統一於農業社會或農業村落這一架構之下的，農業社會的官僚體制因為缺少貨幣管理的技術手段，顯得漏洞百出，不得不用道德力量強以彌補。因此，中國農業社會的問題是道德泛濫，技術不足。

這種農業社會架構下的技術論在解釋中國社會及其後的國共內戰時，最具特色的是其階層結構論：把中國社會分為上層、中層、下層。整個下層結構，即鄉村地區的結構，停留在近乎明代時的架構（頁227）；中層特別弱，卻要承擔國民黨依靠的上層和共產黨動員的下層之間鬥爭的代價；當然，上層也面臨不可調和的問題，蔣介石設立了

一個現代化政府的外觀，也替自己創造出最尷尬的處境。他無法製造出讓政府系統運作的下層結構，只能讓一切維持現狀（頁230）。

國民黨軍隊當時的問題在於「頭重腳輕」，現代化設備大規模引入，只會增加上層的重量，底層大眾更難予以支持，軍隊顯得像是外來力量般對抗中國社會。這個二分法所造成的結構失敗，將大於所謂的貪污無能等溫和的譴責（頁242）。而共產黨則充分利用抗戰的機會，當日軍鐵蹄席捲全國時，村落也必須承擔起戰爭的重擔，共產黨就把自己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大部分的措施都回應了自然經濟的要求（頁402-403），結果共產黨成功了。

黃仁宇的技術論所刻畫的蔣介石相當傳神：蔣介石所面臨的問題太過深重，迫使他用一切行動來使中國團結，而無法依自己的選擇行事。他很可能腐化，因為中國本身就已腐化；他不重組織，因為如果他強施命令，可能會引發內部爭議，而且嚴重到足以使國家再度分裂。他的沉悶無趣很適合他受難英雄的角色。他再也不曾以很帥的姿勢拍照；和外國訪客合照時，他習慣性地擠出笑容；和中國同事和部屬合照時，他的表情總顯得僵硬嚴肅。他讓妻子追求知名度，打造光鮮亮麗的世界，自己則過着無趣無味的生活。希特勒會對副官說笑話，斯大林半夜會小飲一番，蔣介石卻總是自我克制，不曾有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頁235）。黃仁宇認為蔣介石的境遇，不正是中國農業社會結構缺失的形象化象徵嗎？

三 土地改革與集體化

黃仁宇對於土地問題相當關注，但對土地革命中的暴力行為，其所持的態度則頗為複雜。他的立場，既不像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也不像韓丁 (William Hinton, 《翻身》[*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的作者)。前者宣稱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應得；後者則認為長痛不如短痛，為結束長期的痛苦，可以容許短期的殘暴。黃仁宇採取的態度是喀爾文教派的命運預定說和東方哲學的混合物。命運預定說置於自由選擇之後，既可以維持個體自我，又使其保持謙卑，保持對命運的崇敬。這種觀念的核心，是指當期選擇在處於先期抉擇的路徑依賴等約束時，個體有多大自由做出純粹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在生命中，我們似乎遇到無數做決定的機會，但後來再回顧時，每一轉折其實都只有一座橋，選擇縮小到要不要走過去的問題 (頁209)。

就中國歷史來說，表面上看，中國在1926至1950年有很多選擇，但實際上可行動的方式只有國共兩種。個體可以做各種選擇，但事實上都不得不承受國共兩種行動方式的後果。土地改革中，一般估計約有300至500萬人喪生，他們大多是中小規模的地主，且被活活打死。黃仁宇承認他無法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但也無法表示哀悼，因為那樣只顯得假惺惺。他採取最難但也是最簡單的方法，那就是請命運來承擔我們良知的重擔，如果個體有

責任，那麼責任應該由中國人全體來承擔 (頁240-41)。

儘管如此，黃仁宇對中共的土地改革實際上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認為中國土地持有制度是過去數百年來法律和社會制度的產物，符合當時封閉和不具競爭的地位，問題大得無法片面改革。如果不重整村落，就無法在行政上擴大稅收。因此，在抗日期間，共產黨的改革算是取得部分成功 (頁225)。對於農業集體化，黃仁宇也並不反對。他認為，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已廢除三十年，人們必須接受這個歷史的既定事實。他從來不曾崇拜毛澤東，但在美國住了數年後，終於從歷史角度了解這個運動的真實意義。考慮到中國人口過剩、土地稀少、農地不斷分割、過去農民負債累累等諸多因素後，統治者實在無法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就是因為無法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一百多年來才會一錯再錯，連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也不例外 (頁482)。

黃仁宇對中共的土地改革實際上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認為中國土地持有制度是過去數百年來法律和社會制度的產物，符合當時封閉和不具競爭的地位，問題大得無法片面改革。

四 簡略評論

整理了黃仁宇對其問題的答案之後，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問題：為甚麼不講黃仁宇的代表作《萬曆十五年》，或是講他有關明代漕運的博士論文，或談他更為重要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甚或談他的《明代遼東之役》，而要談他的

回憶錄呢？一方面，人們對他的回憶錄似乎關注很少；另一方面，對於用學術研究來回答自己生命中的問題的黃仁宇來說，也許從回憶錄中，人們更能窺見黃仁宇本人的心路歷程，更能從生命經歷的層次上理解其學說。

首先，黃仁宇的結構階層論是具解釋力的，尤其對其所經歷過的歷史階段，有其獨到之處。至於技術論的觀點，也很有新意。他的歷史見解是其人生歷程的一部分，對於這種生命體驗，我們有理由保持高度的敬意。歷史事件對於生命的衝擊所引起的生命體驗，其

見解不管對與錯，都是一種真誠的反應。這是坐在書齋中苦讀紙上文字，卻在身心兩方面都與研究對象有着深刻隔膜的研究者所不能比擬的。黃仁宇成功的奧秘，也許就在這裏。其次，他的倒推研究進路也是可取的。現實是歷史之河的入海口，上游乃至中游的水量、流向、氣候和植被等等都決定了入海口的狀況，從入海口溯流而上所受的阻力，實際上就是從上游順流而下的動力；知道了阻力，也就知道了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研究是有意義的，也是有現實附着的。

從《江渭清回憶錄》看文革在江蘇

● 張 銳

關於文革的發動和開展，包括其在江蘇的興起，江渭清作為當事人的回憶充分說明了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和地方的不一致。這主要是毛與地方大員的思考差異，地方對於文革的發動是毫無準備的。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以下簡稱《江渭清回憶錄》，引用只註頁碼）是江渭清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對自己七十年革命工作的一個總結。江在1949年後長期擔任江蘇省主要領導職務，在50年代中期到文革初期一直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他的回憶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於了解和釋讀文革前